

『通古察今』系列丛书

汉代的历史变易思想

汪高鑫 著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『通古察今』系列丛书

汉代的历史变易思想

汪高鑫 著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汉代的历史变易思想 / 汪高鑫著. — 郑州 : 河南人民出版社, 2019. 12

(“通古察今”系列丛书)

ISBN 978 - 7 - 215 - 12008 - 2

I. ①汉… II. ①汪… III. ①政治思想史 - 研究 - 中国 - 汉代 IV. ①D092.3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9)第 271359 号

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地址:郑州市郑东新区祥盛街 27 号 邮政编码:450016 电话:65788072)

新华书店经销

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

1/32

印张 6

字数 84 千字

2019 年 12 月第 1 版

201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52.00 元

“通古察今”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

顾 问 刘家和 瞿林东 郑师渠 晁福林

主 任 杨共乐

副主任 李 帆

委 员 (按姓氏拼音排序)

安 然 陈 涛 董立河 杜水生 郭家宏

侯树栋 黄国辉 姜海军 李 渊 刘林海

罗新慧 毛瑞方 宁 欣 庞冠群 吴 琼

张 皓 张建华 张 升 张 越 赵 贞

郑 林 周文玖

序 言

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百余年发展历程中，历史学科始终占有重要地位。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，今天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业已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基地，是国家首批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予权单位，拥有国家重点学科、博士后流动站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一系列学术平台，综合实力居全国高校历史学科前列。目前被列入国家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行列，正在向世界一流学科迈进。在教学方面，历史学院的课程改革、教材编纂、教书育人，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，曾荣获国家教学改革成果一等奖。在科学研究方面，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，在出版了由白寿彝教授任总主编、被学术界誉为“20世纪中国史学的压轴之作”的多卷本《中国通史》后，一批底蕴深厚、质量高超的学术论著相继问世，如八卷本《中国文化发展史》、二十卷本“中国古代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”、三卷本《清代理学史》、五卷本《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》、二十三卷本《陈垣全集》，

汉代的历史变易思想

以及《历史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精神》《中西古代历史、史学与理论比较研究》《上博简〈诗论〉研究》等，这些著作皆声誉卓著，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，得到同行普遍好评。

除上述著作外，历史学院的教师们潜心学术，以探索精神攻关，又陆续取得了众多具有原创性的成果，在历史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上连创佳绩，始终处在学科前沿。为了集中展示历史学院的这些探索性成果，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“通古察今”系列丛书。丛书所收著作多以问题为导向，集中解决古今中外历史上值得关注的重要学术问题，篇幅虽小，然问题意识明显，学术视野尤为开阔。希冀它的出版，在促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科更好发展的同时，为学术界乃至全社会贡献一批真正立得住的学术佳作。

当然，作为探索性的系列丛书，不成熟乃至疏漏之处在所难免，还望学界同人不吝赐教。

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
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
北京师范大学“通古察今”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

2019年1月

目 录

前 言 \ 1

第一章 陆贾的历史变易思想 \ 4

- 一、“逆取而以顺守之”：对历史治乱兴衰的一种理解 \ 9
- 二、“三圣”说与古今论：关于历史变易与发展的表述形式 \ 22

第二章 贾谊对历史盛衰之理的探讨 \ 29

- 一、“攻守之势异”：对秦朝历史盛衰之理的考察 \ 30
- 二、“民无不为本”：贾谊仁政思想的核心 \ 37
- 三、以礼治国：贾谊的政治历史秩序论 \ 43

第三章 “三统”说与董仲舒的历史变易思想 \ 50

- 一、“三统”说的基本思想内涵 \ 50

二、“三统”说的变易更化实质\61

第四章 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理论渊源\72

一、哲理基础:《周易》的通变思想\73

二、对邹衍五德终始历史变易观的汲取\79

三、对董仲舒“三统”历史变易观的汲取\86

第五章 刘歆的新五德终始历史学说\98

一、新五德终始说是刘歆而非刘向的历史学说\99

二、新五德终始学说及其创立的政治动机和历史依据\
105

三、新五德终始说蕴含的历史思想\113

第六章 王充的历史发展观\128

一、对是古非今论的批判\129

二、肯定“汉盛于周”的历史发展论\138

第七章 何休对公羊“三世”说的理论构建\154

一、公羊“三世”说的理论渊源\155

二、何休“三世”说的思想内涵\160

三、“张三世”与“通三统”“异内外”的关系 \ 167

参考书目 \ 176

前 言

历史存在的本质形态便是变易，没有变易就没有历史。早在上古时代，我们的先人就已经对这个问题有了认识。《周易》提出的“《易》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”的通变思想，是古代中国最早关于历史变易问题的认识。通变思想是《周易》最有价值的思想之一，其核心是强调自然与社会变易的普遍性和必要性。战国时期的阴阳家邹衍提出五行相胜之五德始终说，认为历史的变易、朝代的更替是按照土、木、金、火、水五行相胜顺序周而复始循环进行的，以此观照战国以前的王朝更替，依次为土德黄帝、木德大禹、金德商汤、火德文王。西汉董仲舒提出“三统”历史变易学说，认为历史朝代是按照黑统、白统和赤统三统依次循环更替的，凡异姓受命而王，必须改正朔，

易服色，变易文物制度。这些变易思想，成为传统史学“通古今之变”思想的理论渊源。

汉代是历史变易思想取得重要发展的时期。这一时期的史家普遍重视“通古今之变”，提出了丰富的历史变易思想。汉初陆贾著《新语》，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，得出“逆取顺守”的历史认识，肯定霸道“逆取”天下，而以仁义王道“顺守”天下；认为从先圣、中圣到后圣的古往今来的历史，是一个礼义制度不断创制和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。贾谊发表“过秦”之论，提出了“攻守势异”的历史变易认识，指出秦朝亡于仁义不施，逆势而行；期望汉朝能够以民为本，实行礼治。司马迁是第一个提出以“通古今之变”为撰述旨趣的史家，《史记》是第一部贯通三千年的纪传体通史。司马迁以“原始察终，见盛观衰”作为“通古今之变”的基本方法，依据“《易》穷则变”之理提出“承敝易变”的历史变革论，同时还汲取了邹衍五德终始说和董仲舒“三统”说的历史循环变易思想，将传统史学历史变易思想推向高峰。

汉代经学家普遍重视构建历史变易学说。今文经学家董仲舒的“三统”说，肯定历史是按照黑、白、赤三统循环变易的，新朝受天命而王，需要改正朔、

易服色，进行文物制度变革。“三统”说以王朝循环更替为表象，以倡导历史更化为实质。汉末今文经学家何休通过改造《公羊传》的《春秋》“三世”划分（所见世、所闻世、所传闻世）说，提出了别开生面的新的公羊“三世”说，肯定历史的发展必然经历从衰乱、升平到太平的“三世”发展过程，太平之世是一个行仁讲义的文明社会。何休的历史变易思想肯定了历史不断进步和发展。古文经学家刘歆提出五行相生之五德终始说，认为王朝更替是依照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五行循环进行的，据此构建了一个以伏羲“为百王先”的新的历史系统。刘歆的王朝更替史观为班固《汉书》所接受，在汉代以后得到长期流行。

东汉杰出思想家王充也发表了关于历史变易的观点。他从体质容貌、社会治理、节义道德和帝王治绩等四个方面今胜于古的历史事实，对当时流行的是古非今论进行了批判；他以社会太平与否，作为王朝是否为盛世的标准；他通过文明进化、疆域拓展、文治武功、帝王仁德和瑞应显现等五个方面对汉代与周代历史进行对比，由此得出“汉盛于周”的结论，体现了其肯定历史变易与发展的思想。

第一章 陆贾的历史变易思想

陆贾（约前 240—前 170 年），西汉初期著名的政治家、思想家、外交家和史学家。在政治实践中，陆贾亲身参加了秦末反秦战争，“以客从高祖定天下，名为有口辩士，居左右，常使诸侯”^[1]。西汉初年，陆贾分别于汉高祖十一年和汉文帝即位之初，两次奉命出使南越。首次出使，使南越武王赵佗接受了汉朝“南越王”的封号，“称臣奉汉约”；二次出使，使赵佗答应“去帝制黄屋左纛”，致使终文景两朝，南越“朝命如诸侯”^[2]。就在高祖十一年首次出使南越归后，陆贾与刘邦进行了一场关于“居马上得之，宁可以马上治之”的著名对话，提出了“逆取而以顺守之”的治国之

[1] 《史记》卷九十七，《酈生陆贾列传》，中华书局 1959 年版。

[2] 《史记》卷一一三，《南越列传》，中华书局 1959 年版。

策，对西汉初年统治政策的改变有着重要影响。此外，陆贾还在诛灭诸吕集团和拥戴汉文帝二事上扮演了重要角色，司马迁说：“及诛诸吕，立孝文帝，陆生颇有力焉。”^[1]陆贾终其一生，虽然官位仅止太中大夫，却事功显赫，身名俱荣，而以寿终。正如班固所说：“陆贾位止大夫，致仕诸吕，不受忧责，从容平、勃之间，附会将相以强社稷，身名俱荣，其最优乎！”^[2]

作为思想家和史学家，陆贾给后人留下了两部重要著作，这便是《新语》和《楚汉春秋》。《新语》乃奉帝王之命而作，它既是一部政论著作，又是一部历史著作。汉高祖十一年，刘邦因反感陆贾常常以《诗》《书》进说而怒骂说：“乃公居马上而得之，安事《诗》《书》！”陆贾则反驳道：“居马上得之，宁可以马上治之乎？”并警告刘邦说：“乡使秦已并天下，行仁义，法先圣，陛下安得而有之？”对于陆贾的发问，汉高祖刘邦面有惭色，无以对答。于是对陆贾说，“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，吾所以得之者何，及古成败之

[1] 《史记》卷九十七，《酈生陆贾列传》，中华书局1959年版。

[2] 《汉书》卷四十三，《陆贾传》，中华书局1962年版。

国。”^[1]陆贾奉命而撰成的这部著作便是《新语》。《新语》一书，共十二篇，陆贾每写完一篇，便上奏高祖刘邦一篇，每篇都得到了刘邦的称许，左右大臣也迎合着欢呼万岁。很显然，陆贾“粗述存亡之征”而成的《新语》，对汉初政治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。对于《新语》的影响和地位，后人已经作了充分肯定。班固在《答宾戏》中写道：“陆子优繇，《新语》以兴；董生下帷，发藻儒林；刘向司籀，辩章旧闻；扬雄覃思，《法言》《大玄》。”^[2]在班固看来，陆贾因作《新语》，而与董仲舒、刘向、扬雄在思想史上拥有同等地位。东汉思想家王充则更是给予陆贾以崇高的评价，他说：“《新语》，陆贾所造，盖董仲舒相被服焉，皆言君臣政治得失，言可采行，事美足观。鸿知所言，参贰经传，虽古圣之言，不能过增。陆贾之言，未见遗阙；而仲舒之言雩祭可以应天，土龙可以致雨，颇难晓也。”^[3]在王充看来，陆贾《新语》言无遗阙，连董仲舒也“相被服”。《楚汉春秋》则是一部记载秦汉之际史事的近代史，班

[1] 《史记》卷九十七，《酈生陆贾列传》，中华书局 1959 年版。

[2] 《汉书》卷一百上，《叙传》，中华书局 1962 年版。

[3] 王充：《论衡》卷二十九，《案书》，黄晖校释本，中华书局 1990 年版。

彪、班固、司马贞等人皆肯定为陆贾所撰。作为汉初仅有的一部反映秦汉之际历史的近代史著作,《楚汉春秋》有着较高的史料价值,是司马迁撰写《史记》的重要参考文献之一。对于《楚汉春秋》的史料价值,后人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,班固说:“秦兼诸侯,有《战国策》。汉兴伐秦定天下,有《楚汉春秋》。故司马迁据《左氏》《国语》,采《世本》《战国策》,述《楚汉春秋》,接其后事,讫于大汉。其言秦汉,详矣。”^[1]一方面肯定《楚汉春秋》是记载秦汉之际史事的重要史著,一方面认为它与《左传》《国语》《世本》《战国策》都是司马迁撰写《史记》所参考的重要资料。史评家刘知幾则更是对《楚汉春秋》推崇备至,他说:“刘氏初兴,书唯陆贾而已。子长述楚汉之事,专据此书。”^[2]《楚汉春秋》今已散佚,但其不少内容因被后人著作大量引用而得以保存,由此出现了一些辑本。如洪颐煊所辑的《楚汉春秋佚文》,据其资料来源统计就有:《史记集解》1条、《史记索隐》20条、《史记正义》5条、《汉书》颜注4条、

[1] 《汉书》卷六十二,《司马迁传》,中华书局1962年版。

[2] 《史通》卷十六,《杂说上》,浦起龙通释本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。

《汉书》晋灼注 1 条、《后汉书》注 1 条、《史通》1 条、《困学纪闻》1 条、《水经注》1 条、《北堂书钞》3 条、《文选》注 7 条、《艺文类聚》3 条、《太平御览》20 条。^[1]《楚汉春秋》被后人所大量引用，无疑也体现了它的史料价值。当然，《楚汉春秋》的史料价值还与陆贾的直书不隐精神分不开。此举一例：《史记》卷七《项羽本纪》载有陆贾奉命“说项王，请太公”失败，而侯公出使却取得成功一事，《史记正义》在此引述了《楚汉春秋》所载高祖因此封侯公一事：“上欲封之，乃肯见。曰：‘此天下之辨士，所居倾国，故号曰平国君。’”并作按语道：“说归太公、吕后，能和平邦国。”《楚汉春秋》是否记载陆贾本人这次有辱君命的出使不得而知，但它却明确记载了侯公的成功出使，给予侯公以高度评价，仅此可知他实际上等于是间接地表述了自己这次出使的失败，他并没有为己讳言此事。王利器认为，“说项王归太公、吕后事，陆贾实在有辱君命。现在虽然仅见侯公说项王一节，必然是陆贾无功，才命侯公复往而踵成之。则陆贾之记此事，必然要详其本末，可

[1] 引自陆贾《新语·附录二》，王利器校注本，中华书局 1986 年版。